

学术之星文库



徐晓望◎等著

闽台商业史 新探

mintaishangyeshi
xintan

 经济日报 出版社

学术之星文库



闽台商业史新探

徐晓望 潘 健 黄洁琼 许莹莹 徐思远◎等著

mintaishangyeshi
xintan

 经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闽台商业史新探 / 徐晓望等著. —北京: 经济日报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 - 7 - 80257 - 741 - 1

I. ①闽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商业史—研究—福建省
②商业史—研究—台湾省 IV. ①F7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81824 号

闽台商业史新探

作 者	徐晓望等
责任编辑	田 苗
责任校对	张明明
出版发行	经济日报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 (邮政编码: 100054)
电 话	010 - 63567960 (编辑部) 63516959 (发行部)
网 址	www. edpbook. com. cn
E - mail	edpbook@126. 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1/16
印 张	14.5
字 数	235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1 月第一版
印 次	201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80257 - 741 - 1
定 价	6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	徐晓望 徐思远	1
清前期闽台商缘的开拓	许莹莹	19
晚清闽台商缘的发展	黄洁琼	70
晚清闽台经济互动与台湾经济的雄飞	徐晓望 徐思远	106
清末民国闽台商缘的异化	潘 健	142
近六十年来闽台商缘的重续	潘 健	189
主要参考文献		216
后 记		226

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

徐晓望 徐思远

在历史上,人类的海洋经济是其海洋文化发展的基础,而海洋文化往往又成为海洋经济定型的关键因素。台湾的海洋经济初步形成于明清时代,当其萌芽之际,台湾经济便受到了闽粤海洋文化的巨大影响,这一影响渗透到台湾经济的各个层面,从而铸就台湾海洋经济之个性。

一 明代闽粤海盗文化与台湾的开发

海盗文化是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提出海洋文化理论的黑格尔^①说:“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,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,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。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,从事掠夺。”^②这类以“征服与掠夺”为主题的海洋文化,即是海盗文化,它也是古希腊、古罗马海洋文化的一个特征。在中国的海洋文化中,海盗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内容。不过,明清时期海盗的出现,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有关。

① 黑格尔在《历史哲学》一书提出:西方是以流动为特点的海洋文化,东方是以静止为特征的大河文明;其实,中国古代也有发达的海洋文化,参见:徐晓望《论中国历史上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征》,《东南文化》1988年第3-4期;徐晓望《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》,广州:《学术研究》1998年第3期。

② 黑格尔:《历史哲学》,王造时译本,北京,三联书店1956年,第135页。

明代的海禁是中国海洋史上的重大事件,它使中国唐宋以来传统的海洋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。在海禁最严厉的时代,多数港口失去了船影,北方许多地区,民众不以海鱼为食,马可波罗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,渐渐退化为内陆商业城市,就连当地的福建市舶司,也从泉州迁到福州。但是,在研究明代初年的海禁之时,很少有人想到:其实明代的海禁政策并未在中国沿海得到全面的贯彻,至少在闽粤交界的漳州与潮州,当地民众仍然下海贸易,如果官军前来制止,他们便拿起武器反抗,于是形成了以漳潮人为主的闽粤海盗团体。明代初年,漳潮海盗多次与明朝水师作战,并将他们击败。^①于是,中国古老的海洋文化在闽粤边区得到延续,而海盗文化一时成为这一时代海洋文化的代名词。明代前期,漳潮人将自己的海洋文化发展到南洋的许多地区,这是郑和下西洋时在旧港遇到陈祖义为首的漳潮海盗的原因。所以,从本质上来说,明代的海禁未能完全泯灭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,它只是化明为暗,从海疆城市的公开交易变为海疆边远区域的私人贸易,而其贸易的主体,也从合法的市民变为非法的民间武装,这类武装,是当之无愧的“海盗”。

从明初以来,当海盗成为漳潮许多区域的“文化传统”,景泰年间,“月港、海沧诸处居民多货番,且善盗。”为了制止这些海盗,官府想尽各种办法。漳州知府谢骞的办法是:每隔一段时间就将月港、海沧的民众请到府衙来做客,使他们没有时间去当强盗。^②但这一办法肯定无法持久。其后王阳明、俞大猷等人的对策是在海沧、月港一带招募“海沧打手”充任官军,达到“以盗止盗”的目的。然而,迄至倭寇时期,仍然有许多漳潮人去当倭寇,因此,戚继光大败倭寇之后,“倭寇”的队伍不是从海上遁走,而是从福建境内逐步退到漳州和潮州,并在潮漳边界又坚持了十几年,一直到万历中期仍有活动。万历末年,漳潮海盗再度猖獗起来,并有泉州籍海盗参加,这就是袁进、郑芝龙系统的海盗。^③迄至郑成功崛起,闽粤海盗基本上控制了台湾海峡。正如崇祯年间的傅元初所

① 徐晓望:《论明代双屿港的漳州海盗》,2011年8月浙江双屿港研讨会论文。

② 何乔远:《闽书》卷六十四,文莅志,漳州府,谢骞传;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,第三册,第1855页。

③ 徐晓望:《郑芝龙之前开拓台湾的海盗袁进与李忠——兼论郑成功与荷兰人关于台湾主权之争》,漳州,《闽台文化交流》2006年1月。

说:“历稽往事,自王直作乱,以至今,海上故不能一日无盗,特有甚不甚耳。海滨之民,惟利是视,走死地如骛。”^①

在世界史上,海盗是海上秩序的破坏者,同时,他们也是一批海洋冒险家,海洋上的边远岛屿常是他们驻足的地方。闽人探航台湾有悠久的历史,宋元时期,福建与台湾的联系已经相当频繁。台湾岛北部的流求国,“别置馆于海隅,以待中华之客”。^② 明朝海禁政策实行后,澎湖巡检司撤退至泉州,台湾海面一时罕有福建水师活动。但是,福建水师放弃的地方,往往成为闽粤海盗活动的区域。明弘治、正德之际,费宏在送陆君美的一文中说:“琉球、日本诸海国,去闽仅数千里,而澎湖、鼉鼉、高华诸屿,隐然可数于烟波浩淼之间。奇货珍材以售于华人,获辄数倍。故滨海冒禁之民,往往通贾胡,驾巨舶,倚风涛,旁午出没。”^③ 此文中的“澎湖、鼉鼉、高华诸屿”,便是当时对台湾的称呼。这条史料表明,闽粤海盗早在明代中叶就来到了台湾,乃至费宏等人怀疑倭寇也有在台湾活动。其实,明中叶以后的倭寇有一些为华人^④,而且主要是漳潮海盗。倭寇活动的后期,漳潮海盗受到沉重的打击,便向澎湖与台湾逃窜,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潮州海盗林凤、林道乾。^⑤ 万历三十年,福建水师参将沈有容在台湾海面袭击一股来自广东的“倭寇”,而后登上了台湾,访问当地的东番首领,从而使福建官府与东番首领之间建立了共同对付海盗的同盟。^⑥ 万历末年,泉州同安人袁进纠合海盗驻扎于台湾的“赤崁(即赤嵌)”,他们有数千盗

① 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卷四二,兵部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40页。

② 李复:《涵水集》卷五,与乔叔彦通判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19-20页。参见:徐晓望《隋代陈稜、朱宽赴流求国航程研究》,《福建论坛》2011年第3期。

③ 费宏:《太保费文宪公摘稿》卷九,送福建按察司副使陆公君美序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331册,第435页。

④ 在中日学术界,最早持这一观点的有日本的田中健夫与中国的戴裔煊、林仁川等人。参见:戴裔煊:《明代嘉隆年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》,北京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;林仁川:《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》,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。田中健夫《倭寇——海上的历史》,日本,教育社1982年。

⑤ 徐晓望:《晚明在台湾活动的海盗》,北京:《台湾研究》2003年第3期。

⑥ 陈第:《东番记》,沈有容:《闽海赠言》,台湾文献丛刊本,第26-27页。

伙,并有大船数十艘。^①袁进被招安之后,明末又有颜思齐、郑芝龙、李魁奇、鍾斌等海盗团伙在台湾活动,他们也在台湾驻扎数年。崇祯十三年吏科都给事中王家彦在奏疏中说到:“闽省海隅,地如巾帨,民耕无所,且沙砾相薄,耕亦弗收。加以年荒赋急,穷民缘是走海如鹜。长子孙于唐市,指窟穴于台湾,横海鸱张。如先年周三、李魁奇、鍾斌等,其最毒者也。”^②

明代的海盗往往是亦商亦盗。张增信认为,林道乾等人在台湾的海盗活动,对台湾沿海航路的形成有其重要意义。^③事实上,袁进及颜思齐、郑芝龙在台湾时,也是漳泉海商在台湾活动的时候。明朝严禁月港的海商到日本贸易,但允许月港商人到台湾的鸡笼、淡水、北港等港口贸易,于是,漳泉商人以到北港贸易为理由申请“船引”,抵达台湾的北港后,又北上日本的平户及长崎二港。有时候,他们也在北港与南下的日本商人贸易,这便使台湾的北港成为一个贸易据点。袁进及李忠的海盗在名为“赤墘(今台南赤嵌)”的地方建立水寨,开始长期定居。^④其实,正是闽粤海盗的活动开发了台湾的北港、鸡笼、淡水诸港,而闽粤海盗的主要港口北港,恰是中日贸易进行的地方。明万历末年,台湾海盗袁进被招安之后,林锦吾成为台湾北港的海商首领,但其人无法处理当地商人之间的争执,不得不申告福建右布政使沈演等人。^⑤至于明末海盗首领李旦及郑芝龙,干脆以北港为基地做贸易,往来于日本及台湾、漳泉之间。^⑥天启年间,荷兰及西班牙的“海盗政权”出现于台湾。据张燮《东西洋考》的记载,荷兰人之所以来到台湾,首先是一些闽南商人将荷兰人带到澎湖列岛,在引起明朝抗议之后,又是李旦、许心素为首的闽南商人居间调停,最后

① 徐晓望:《郑芝龙之前开拓台湾的海盗袁进与李忠》,福建漳州:《闽台文化交流》2006年1月。

② 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卷四二,兵部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36页。

③ 张增信:《明季东南海寇与巢外风气》,张炎宪:《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》,第三辑,台北中研院1988年刊,第339页。

④ 徐晓望:《论明代台湾北港的崛起》,《台湾研究》2006年2期。

⑤ 徐晓望:《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》,福州:海风出版社2006年,第179-181页。

⑥ 岩生成一:《明末侨寓日本的中国人甲必丹李旦考》,许贤瑶译:《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》,台湾,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1年,第59页。

明朝的官员默许荷兰殖民者占用台湾的北港。^①

台湾分别被荷兰人及西班牙人占据后,再次成为国际海盗的巢穴。当时的荷兰人及西班牙人,都在海上劫掠对方的船只以及与对方贸易的中国船只,这给中国商人带来巨大的压力。不过,荷兰人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城堡,客观上成为闽粤民众深入台湾的据点。就在荷兰人城堡的周围,逃荒至台湾的福建移民开垦了大量的农田,发展水稻种植业和甘蔗种植业。然而,荷兰人的残酷剥削最终激怒了他们。为了对付荷兰及西班牙的海上力量,闽粤海商力挺郑芝龙及郑成功父子。^②而郑氏父子在海上崛起,也被明清二朝视为海盗,但就是在他们的领导之下,闽粤商人全面控制了台湾,郑成功及郑经将土地分给军队的将领,鼓励他们开发良田,发展农业^③,从此,台湾的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。

总之,在明初的海禁之后,最早是闽粤海盗探索台湾沿岸的各个港口,并在当地屯住,从而开拓了台湾的对外贸易的港口。而后荷兰及西班牙人的“海盗政权”,在台湾南北分别建立了驻扎军队的据点,控制了部分沿海平原,这使台湾沿海区域进入农耕时代;迄至郑成功及郑经时期,闽粤民众对台湾的开发深台湾内地,为台湾平原区域的农耕经济及城市经济奠定了基础。

二 闽粤人的重商文化与台湾商人集团的形成

在黑格尔看来,海洋商业是海洋文化的重要展现:“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,从事掠夺,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,从事商业。……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。航海的人都想获利,然而,他们所用

① 岩生成一:《明末侨寓日本的中国人甲必丹李旦考》,《东洋学报》第23编第3号,1936。

② 徐晓望:《论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与福建商人关于台湾海峡控制权的争夺》,《福建论坛》人文版2003年2期。

③ 陈汉光:《郑氏复台与其开垦》;曹永和:《郑氏时代之台湾垦殖》,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:《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,第25-77页。

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,因为,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。”^①对我们来说,黑格尔所说的海洋商业观念并非只在西欧国家发展,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。^②由泉州人、漳州人、潮州人构成的闽南商团,是中国最早的海商集团,早在唐宋时期,他们就探航海外,顺着海上丝绸之路,一直来到西亚及东非的海岸。^③那一时代的晋江半岛,因土地贫瘠,当地居民以海上贸易的收入维生,并从两浙路、广南东西路运入粮食。^④宋元时期的泉州商人走遍亚洲沿海区域及东南亚的海上岛屿,他们是这一时代最成功的商人。就宋元时期的情况来看,毫无疑问,“闽南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”。^⑤

明朝是闽南商人的又一个辉煌时代。明朝实行海禁之后,是漳潮民众最先冲破海禁到海上航行^⑥,明代中叶,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南海贸易。^⑦从潮州人与泰国的密切关系来看,他们早在明代前期就在暹罗(泰国)经营商业,而后在泰国获得极大的成功。这类情况在东南亚是普遍性的,东南亚的各个港口都有闽粤移民居住。葡萄牙人来到东方后,与漳潮商人结下深厚的关系,是漳潮海盗商人将葡萄牙人带到浙江舟山的双屿港。^⑧西班牙人来到菲律宾之际,在马尼拉贸易的华商亦以漳泉商人为多。“漳人以彼为市,父兄久住,子弟往返,见留吕宋者盖不下数千人。”^⑨荷兰人抵达东南亚,也是闽南人最先与其贸易。^⑩尽管有欧洲殖民者卷入远东贸易,然而,“当时东亚水域的贸易优势始终掌握在华人手中。”^⑪

① 黑格尔:《历史哲学》,王造时译本,北京:三联书店1956年,第135页。

② 徐晓望:《妈祖的子民——闽台海洋文化研究》,上海:学林出版社1999年。

③ 桑原隲藏:《莆寿庚事迹》,东京,平凡社,1989年重版。李东华:《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》,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。

④ 全汉昇:《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》,《中国经济史论丛》第一辑,香港新亚研究所。

⑤ 徐晓望:《论闽南人与中国海洋文化》,泉州:《闽南》2010年第2期。

⑥ 徐晓望:《明代漳州商人与中琉贸易》,《海交史研究》1998年第2期。

⑦ 徐晓望:《严启盛与澳门史事考》,澳门文化司署《文化杂志》2006年春季刊总58期。

⑧ 徐晓望:《论明代双屿港的漳州海盗》,2011年8月浙江双屿港研讨会论文。

⑨ 许孚远:《敬和堂集》,疏通海禁疏,日本东尊经阁藏明刊本,第20页。

⑩ 张燮:《东西洋考》卷六,外纪考,红毛番,北京:中华书局2000年,第127页。

⑪ 张彬村:《十六至十八世纪华人在东亚水域的贸易优势》,张炎宪:《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》第三辑,第345页。

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,闽粤商人集团发展很快。明代晚期,海澄建县后,漳州商人获得了合法经营海外贸易的权利。“饶心计与健有力者,往往就海波为阡陌,倚帆樯为耒耜,凡捕鱼纬箫之徒,咸奔走焉。盖富家以货,贫人以佣,输中华之产,骋彼远国,易其方物以归。博利可十倍。故民乐之。”^①许孚远说:“据海澄县番商李福等连名呈称:本县僻处海滨,田受咸水,多荒少熟,民业全在舟贩,赋役俯仰是资。”^②其时漳州月港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。周起元说:“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,于是五方之贾,熙熙水国,刳脰脍,分市东西路。其捆载珍奇,故异物不足述,而所贸金钱,岁无虑数十万。公私并赖,其殆天子之南库也。”^③“大都澄民之习夷者,什家而七”,他们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。^④万历年间的月港已是“货物通商旅,资财聚富商”。^⑤当地商人拥有大海船百余只,“货物亿万计”。^⑥来自海外的商品在海澄县堆积如山,王应山说:“海澄新邑,珠玑、犀牙、玳瑁、香、布之属辐辏。”^⑦泉州的对外贸易也在嘉靖年间重兴。嘉靖二十三年,泉州安平镇的黄堪说:“本年三月内,有日本夷船数十只,其间船主水梢,多是漳州亡命,谙于土俗,不待勾引,直来围头、白沙等澳湾泊。”^⑧从此,泉州人也加入了海上贸易。明末泉州的安平镇(又名安平镇)已经是著名的海港城市,“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隅,濒于海上,人户且十余万,诗书冠绅,等一大邑。”^⑨

闽南人(漳泉潮)商业的发达,使其思想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。漳泉潮一带,形成了重商的习俗。何乔远论泉州:“吾郡安平镇之为俗,大类徽州。其地

① 张燮等:崇祯《海澄县志》卷十一,风土志,北京,书目文献出版社:《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丛刊》,1990年影印本,第1页。

② 许孚远:《敬和堂集》,疏通海禁疏,第20页。

③ 张燮:《东西洋考》,谢方点校,北京,中华书局2000年,第17页。

④ 高克正:《海上采金议》,蔡世远等:康熙《漳州府志》,卷三十,艺文志,康熙五十三年刊本,第51页。

⑤ 徐渤:《海澄书事寄曹能始》,邓来祚等:乾隆《海澄县志》卷二十,艺文,第6页。

⑥ 许孚远:《敬和堂集》,疏通海禁疏,日本东尊经阁藏明刊本,第20页。

⑦ 王应山:《闽大记》卷十,风俗考,福建社会科学院藏抄本,第2页。

⑧ 黄堪:《海患呈》,安海志修编小组:新编:《安海志》卷十二,海港,第127页。

⑨ 何乔远:《镜山全集》卷五二,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。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,转引自:安海志修编小组:新编《安海志》,1983年自刊本,第136页。

少而人稠,则衣食四方者,十家而七。故今两京、临清、苏杭间,多徽州、安平之人。第徽人以一郡,而安平人以一镇,则徽人为多。是皆背离其室家,或十余年未返者,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别识。盖有新婚之别,聚以数日离者。”^①李光缙也说:“吾温陵里中,家弦户诵,人喜儒不矜贾。安平市独矜贾,逐什一趋利,然亦不倚市门。丈夫子生已及弁,往往废著鬻财,贾行遍郡国,北贾燕,南贾吴,东贾粤,西贾巴蜀,或冲风突浪,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。近者岁一归,远者数岁始归,过邑不入门,以异域为家。壶以内之政,妇人秉之。此其俗之大都也。”^②泉州安平镇的儒业也很发达,该地做官的人很多,并产生过蔡清、王慎中等著名的大儒。这些大儒虽然服膺儒学,但也敬重商业。蔡清对朋友说:

“三代以降,井牧之制不复,又别是一乾坤矣。天下之生,纷纷董董,上之人大概都不甚照管他。号照管者,恐亦未尽其道,只是任他自贫、自富、自有、自无,惟知有田则有租,有身则有庸而已。田连阡陌由他,无卓锥之地亦由他也。则夫今之士者,上既未得有官者之禄,下又不得为农工等事,老者欲安,少者欲怀,如何得全不为一家数口计长远,而徒坐守穷饿,朝不谋夕哉。许鲁斋先生固尝有言以教学者矣。足下且有二弟,可令事此。但要戒令勤恪不华。如清则孑然只身,却有难者耳,近日亦颇为费心。非是图货财滋植,但得免债负,能自给,斯过望矣。借人钱本,令的当兄弟或义男营运生理,此决不害义。但营运要取利少而平稳者,是长策耳。亦恐欲速不达也。因便寄去云云。”^③

从蔡清的这封信中我们可知,其实蔡清自己也是靠商业谋生,所以,他提倡儒者也可以经商,甚至可以放高利贷,只是不要将眼前利益看得过重,经营要有长远性。既然儒者这样看待商业,老百姓更是重商主义的实践者。泉州商人郑承元,“剖橐中余藏,出金钱数千缗,委二三苍头,转毂旁郡国,通四方异货,逐赢得为奇胜,身治产积居,不窥市井,不行异邑,坐而待收,与里中贵公子

① 何乔远:《镜山全集》卷四八,寿颜母序,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,第12页。

② 李光缙:《景壁集》卷四,史母沈儒人寿序,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影印明崇祯十年本,第726页。

③ 蔡清:《虚斋集》卷二,寄李宗一书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6-17页。

当世之贤人所以富者同乐。观时变趋若鸷鸟之发,犹孙吴之用兵,商鞅之行法,人虽学其术,弗如之矣。一年之中,收息什之,数岁之后,收息伯之。最后息千之。公以此起家……乃锐身出与家仆俱南走越,北走吴,酤出入金钱而卷之。”^①弃儒经商成为常态,“(林某)弃儒习贾业,比壮有余积,主海舶为业。曰商行。”^②在交通条件不佳的古代,泉漳潮民众扬帆出海,走遍东南亚每一个港口做生意。他们擅长计算,每到一地都赚到盆盈钵满,因而被称为“东方的犹太人”,又因闽粤帆船在南海上穿梭往返,他们又被称为可以与荷兰人相比的“海上马车夫”。漳泉潮海商集团就此成长起来。清代的《闽政领要》论述漳州府:“府人民原有三等,上等者以贩洋为事业,下等者以出海采捕驾船挑脚为生计,惟中等者力农度日,故各属不患米贵,只患无米”^③。可见,不论贫富,闽南人都与海洋贸易息息相关。清代中叶,漳泉籍闽南商人大都聚居于厦门。“厦门故海上一都会,以资自雄者不啻十数家。”^④据梁嘉彬的《广东十三行考》,嘉庆、道光年间广州的行商,多从厦门移去,他们多为漳州籍和泉州籍的商人。因此,英国人来到东方后,对厦门商人十分敬重,鸦片战争前夕,一个英国人曾这样评价闽南商人:

“厦门的港口是优良的……当地人民似乎是天生的商人与水手。由于他们家乡的贫瘠,多数人无业可就,但是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性格驱使他们离乡背井,到台湾、到中华帝国的各个主要商业中心,或者到印度洋群岛,或者到他们本土沿岸的渔场去。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,就很少再贫困下去,相反地,他们往往变得富裕起来。由于他们资金多,人又勤劳和擅长经营,他们于是支配着全岛和全省的贸易。他们的家乡观念很重,每当他们获得少量财产,不是立即回家,就是把大笔款项汇回来……难怪,大部分的中国船只属于厦门商人所

① 李光缙:《景壁集》卷十三,梅峰郑季公先生传,第2226-2227页。

② 周凯《内自讼斋文集》卷七,林君墓志铭。清道光二十年爱吾庐刻本。

③ 德福等:《闽政领要》卷中,岁产米谷,第22页。

④ 周凯《内自讼斋文集》卷十,吴宜人寿序。

有,大部分投入沿岸贸易的资金也是他们的财产。”^①

100多年前的英国号称“日不落帝国”,英国商人经营的商业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,然而,偏是英国人给予闽南人如此之高的评价!对于闽南商人的历史地位,其实不需要再多费笔墨。

闽南商人与台湾商人集团的崛起。强大的闽南海商集团早在明代就将自己的势力伸入台湾。当郑成功在台湾土地上升起大明旗帜的时候,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,这是闽南商人的胜利。台湾原为闽南人经营的地盘,却在明代末年被荷兰人占据。当这一事件发生之初,闽南人还以为多了一个贸易伙伴,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。然而,事实的演变使他们失望,荷兰人在台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,开始限制闽南人的商业活动,并用种种理由猎取闽南人的利益。他们之间的争议最终引来了闽南杰出政治家郑成功对台湾的讨伐,荷兰人走了,台湾从此成为闽南人的囊中物——首先是闽南商人郑成功、郑经的天下。^②当时郑成功与郑经将闽南商人团结在自己的周边,率领他们进行东亚的商业拓展。不过,这一商团的根本目标是控制大陆的对外贸易,所以,不论他们与清廷之间的战斗打得多么激烈,双方都在寻找合作的机会。在清廷的分化之下,多数闽南的政治人物投入清朝,并成为清廷利益的代表人物。清朝通过他们瓦解了明郑政权,并统一了台湾。此后,闽南人在清朝的政府里形成隐然可见的一股力量,其代表人物,先有施琅,李光地,后有蔡世远、蓝鼎元等人,清廷对台湾政策及海洋政策,多在他们的影响下制定。清朝驻守台湾的水师将领,也多由闽南人担任。所以,尽管台湾有明清朝代的更替,但闽南人对台湾的控制没有任何变化。台湾府成立后,又隶属于台厦道管辖,台厦道长驻泉州府属的厦门,这也造成漳泉人在台湾的特殊地位。“台民皆徙自闽之漳州、泉州、粤之潮州、嘉应州。其起居、服食、祀祭、婚丧,悉本土风,与内地无甚殊异。”^③官府

① (英)胡夏米《“阿美士德”号中国北部口岸航行报告》,见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主编:《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,第97-98页。

② 徐晓望:《论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与福建商人关于台湾海峡控制权的争夺》,《福建论坛》人文版2003年2期。

③ 丁绍仪:《东瀛志略》卷三,习尚,台湾文献丛刊本,第32页。

承认：“汝等客民，与漳、泉各处之人，同自内地出来，同属天涯海外离乡背井之客。”^①“窃以台湾民鲜土著，半系籍隶漳、泉。”^②这使漳泉商人在台湾有较大的优势。“台湾弹丸，外区为逋逃渊藪。近地多漳泉人，外多系土番”。^③闽南人到台湾，也将他们重商的习俗带到台湾，清代前期的台湾人“负贩贸易，颇似泉漳”^④，较大的商人，则多源自内地，因而有“海船多漳、泉商贾”之说。^⑤

如果说清代早期台湾的商人以漳州人为多，自清中叶以后，台湾的商界，泉州人占据独特的地位。这是因为，清代前期渡台的两个港口都隶属于泉州。当厦门最早成为对渡台湾的合法港口之时，虽然厦门是泉州的属地，但其地漳州商人甚多，所以，台湾对漳州贸易发达。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，清朝增补泉州的蚶江为对台贸易港口，该港与台湾的台南港、鹿港之间都存在着贸易，这使泉州人在台湾商界的地位更高。台湾的彰化县是鹿港所在地，道光《彰化县志》记载：“远贾以舟楫运载米、粟、糖、油，行郊商皆内地殷户之人，出货遣伙来鹿港，正对渡于蚶江、深沪、獭窟、崇武者曰泉郊，斜对渡于厦门曰厦郊，间有糖船直透天津、上海等处者，未及郡治北郊之多。”^⑥当时经营对台贸易的商人，大都要将在台湾采购的商品运到厦门、蚶江等港口之后再北上江南及渤海的港口，这是因为，驻台商人多是厦门及蚶江商人的代表。清代中叶以前，其实没有严格的台湾商人。台湾多数商号，都是泉州蚶江及厦门商号的分支，来往于两地港口的商人，在台湾，也许可以称为台湾商人，在大陆，他们不是以泉州商人自称，就是以厦门商人为荣，个别商人的籍贯，则是在漳州等地。由于漳泉紧密不分的关系，晚清以前，在大陆各个重要港口，只有泉漳会馆或是漳泉会馆，从来没有台湾商人自己的会馆。在台湾的港口，商人分为北郊、南郊，北郊做北方港口生意，南郊做南方港口生意。其实，厦门的商人也有北

① 蓝鼎元：《东征集》卷五，谕闽粤民人。蓝鼎元：《鹿洲全集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，第586—587页。

② 丁曰健编：《治台必告录》卷七，统军到彰督剿余匪折。台湾文献丛刊第17种，第509页。

③ 林谦光：康熙庚午《台湾府纪略》，风俗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，史部214册，第278页。

④ 周玺：道光《彰化县志》卷九，风俗，商贾，台湾文献丛刊本，第290页。

⑤ 黄叔瓚：《台海使槎录》卷二，商贩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35页。

⑥ 周玺：道光《彰化县志》卷九，风俗，商贾，台湾文献丛刊本，第290页。

郊、南郊之分,同样是北郊走北方航路,南郊走南方航路,他们的经商范围完全一样。因此,所谓台湾商人,往往就是厦门商人,厦门的北郊和台湾的北郊,其实是同一商人组织,其成员也是同一批人。一直到了1875年台湾建省之后,台湾人在北京才有了自己的会馆,开始有了自己的商帮组织。不过,即使在日本人统治时期,台湾商人在闽南仍然能找到自己的知音。

明清时期,中国的海上贸易网络实际上是由闽南(漳泉潮)人控制的,所以,台湾商人与漳泉的密切关系,意味着加入闽南人在东亚的商业网络。其实,台湾正是闽南人商业网络的一部分。从台湾商人发展史来看,他们原为闽南商帮的一个分支,而后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。台湾的重商文化起源于闽南,也可以说,它是闽南海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三 以海上贸易为导向的闽南经济和台湾经济

海洋经济发展的最高点,在于该地经济与海洋连为一体,休戚相关。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是自然经济,农人手中只要有一把锄头、一片土地,他们就可以耕地生存;海洋经济则建立在“耕海”基础上,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与大海有关,海洋给他们带来利润与食物,没有海洋,他们固有的生存方式就无法延续下去。

古代漳泉潮区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以海上商业为前驱的海洋经济。早在唐宋之际,泉州人“每岁造舟通异域”,开拓了闽南通向西亚北非的“海上丝绸”之路。明清时代,闽南生产的各种瓷器和陶器,是东南亚各地最常见的日用品。闽南的白糖,更是受到欧洲国家的欢迎。因月港成为晚明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,漳泉潮一带的丝织业也发展起来。^①明清时代闽粤海上贸易的发达,改变了闽南人的经济结构。自从明代中叶开始,泉州沿海就出现了城镇化的倾向^②;这一趋势同样出现于漳州与潮州。陈全之在嘉靖十九年至嘉靖三十年

① 徐晓望:《明代福建丝织业考略》,《福建史志》2004年1期。

② 徐晓望:《论晚明泉州区域市场发展的瓶颈》,《福建论坛》文史哲版,2009年第8期。

期间撰写《蓬窗日录》的时候,“漳之龙溪县海沙(沧?)、月港者,夷货毕集,人烟数万。”^①晋江的安平镇,明末也是十万人以上的大镇。明代大厦门湾周边市镇的发展,最终导致厦门城的崛起。^②

闽南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样出现于农村。例如,这一时代泉州农村,不再以粮食生产为其主要产业,而是发展在市场上可以取得较高价值的商业性农业。万历年间的《泉南杂志》记载:“甘蔗,干小而长,居民磨以煮糖,泛海售焉。其地为稻利薄,蔗利厚,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。故稻米益乏。”^③这条史料说明当地人种蔗业的规模已经影响了粮食生产,于是,他们的粮食消费主要靠海上贸易通道进口。^④这种状况在晚明愈演愈烈,明代的《泉州府志》说:“且近年以来,生齿日繁,山穷于樵采,泽竭于罟网,仰哺海艘,犹呼庚癸。非家给人足之时。顾物力甚绌。”“封疆逼狭,物产饶瘠,桑蚕不登于筐茧,田亩不足于耕耘。稻米菽麦,丝缕绵絮,由来皆仰资吴浙。惟鱼虾羸蛤之利稍稍称饶。”^⑤当地物质的缺乏,迫使本地从外地进口各种消费品,“泉地斥卤而饶确,资食于海外,资衣于吴越,资器用于交广,物力所出,盖甚微矣。”^⑥

漳州农村的变化也不亚于泉州,清初的龙溪县农民:“惟种蔗及烟草,其获利倍,故多夺五谷之地以与之。田渐少,而粟弥匮乏,几何其不朽腹耶?”^⑦康熙年间的《漳州府志》说:“烟草,相思草也。甲于天下,货于吴、于越、于广、于楚汉,其利亦较田数倍。”^⑧讲闽南话的龙岩也是著名的烟草产地。龙岩烟商走遍全国各地开设烟厂。^⑨

闽南人更为突出的是下南洋贸易,乃至在海外形成了华侨社会。例如在

① 陈全之:《蓬窗日录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,第40页。

② 徐晓望:《论明代厦门湾周边港市的发展》,《福建论坛》文史哲版,2008年第7期、徐晓望:《论晚明泉州区域市场发展的瓶颈》,《福建论坛》文史哲版2009年第8期。

③ 陈懋仁:《泉南杂志》卷上,丛书集成初编第3161册,第7页。

④ 徐晓望:《福建通史·明清卷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,第347-349页。

⑤ 阳思谦等:万历《泉州府志》卷三,风俗,泉州市编纂委员会1985年影印明万历刊本,第55页。

⑥ 怀荫布等:《泉州府志》卷十九,物产志,光绪重刊乾隆二十八年本,第1页。

⑦ 吴宜燮等:乾隆《龙溪县志》卷十,风俗志,乾隆二十七年刊本,第2页。

⑧ 蔡世远等:康熙《漳州府志》卷二十六,民风,1984年福建省图书馆抄本,第13页。

⑨ 林仁川:《明清福建烟草的生产与贸易》,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1999年第3页。